

'90《三国演义》研究



《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

巴蜀书社

'90《三国演义》研究

《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

中国《三国演义》学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绵阳市委员会

主 编 谭洛非

副主编 沈伯俊 高显齐

巴 蜀 书 社

1992.4·成都

(川)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王大厚

封面设计：丘云松 张复祥

版式设计：李 洪

'90《三国演义》研究

《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科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4 字数 347 千

1992年4月第一版

1992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7-80523-440-X/I·183

定价：7.50元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还有以下同志

王大厚 李德书

胡振务 钟利戡

曹学伟 谭良啸

目 录

《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综述……………孟彦（1）

· 《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 ·

历史、道德评价的悖理与传统文化心理……………谭洛非（9）

亚史诗：《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李时人（25）

中国封建君臣关系的沿革演变

——《三国演义》伦理观纵横谈之一……………熊笃（39）

论《三国志演义》中的“知遇之感”……………梁归智（52）

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反思…周甲禄（62）

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回归……………单长江（71）

略谈《三国演义》与中国古代军事文化……………任昭坤（80）

《三国演义》中的决策意识……………冯子礼（88）

《三国演义》的道德悲剧……………齐裕焜 陈惠琴（99）

《三国演义》与儒家政治思想……………刘长荣 濮实（109）

· 作者与版本源流 ·

- 关于罗贯中生平的新史料……………周楞伽 (119)
《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探考……………王长友 (131)

· 人物形象研究 ·

- 论诸葛亮形象的才智系统及其民族文化意蕴……………刘上生 (149)
道教与诸葛亮的形象塑造……………曹学伟 (169)
再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王立言 (181)
知其不可而为之
——诸葛亮的悲剧精神……………刘洛 (190)
论蜀汉和诸葛亮的悲剧……………欧阳代发 (199)
出世与入世
——从三顾茅庐谈诸葛亮的深层心态……………何红英 (210)
义士·圣人·天神
——关羽形象的文化透视……………叶松林 (218)
张飞性格审美谈……………梅铮铮 (230)
谈罗贯中笔下的赵云形象的创造……………姚品文 张峰 (239)
浅议蜀汉人物的悲剧特色……………陈伟 (249)
论孟获……………李兆成 (258)
群雄之死……………冯全生 (269)

· 创作方法与艺术成就 ·

- 《三国演义》和中国的古典主义……………黄幼 (281)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叙事艺术浅探……………傅隆基 (297)

- 《三国演义》札记三则……………赵庆元 (314)
- 《三国演义》“智谋”故事模式及其深层结构…宋常立 (326)
- “三分”的艺术构思与荆襄的战略地位……………余大平 (337)

· 地位与影响 ·

- 爱新觉罗氏与《三国演义》……………盛瑞裕 (345)
- 《三国演义》与明清演义小说批评……………齐鲁青 (359)

· 《三国演义》与绵阳 ·

在绵阳兴建“三国蜀汉旅游城”的必要性和

- 可行性初探……………高显齐 (374)
- 试析涪县在蜀汉历史中的地位……………谭良嘯 (380)
- 绵阳古史话三国……………钟利戡 (387)
- 《三国演义》涪城等带“涪”字地名考辨……………江瑞炯 (399)
- 《三国演义》与绵阳三国戏……………李德书 (408)
- 蜀汉在梓潼的遗迹考实……………赵欣 陈万戎 敬永金 (414)

- 《〈三国演义〉校理本》前言……………沈伯俊 (422)

· 简讯 ·

- 绵阳市《三国演义》学会成立…………… (61)
- 广元市《三国演义》学会成立…………… (70)
- 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名单…………… (439)
- 编后…………… (441)

《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 学术讨论会综述

孟 彦

由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政协四川省绵阳市委员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联合发起的“《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第六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1990年9月10日至14日在四川绵阳（汉代三国时期的涪县）举行。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130余名学者出席会议，共提交论文130篇。

近几年来，《三国演义》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本体研究”（文学的研究）硕果累累，“应用研究”（文化的研究）初见成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此基础上，本届讨论会鲜明地提出“《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的命题，力图从更广阔的视野，对《三国演义》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研究，以达到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目的。

会议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

（一）关于《三国演义》的文化内涵和价值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作为一部对中华民族精神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巨著，《三国演义》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具

有极大的文化价值。正如何满子指出的，从文学的研究拓展到文化的研究，乃是《三国演义》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许多学者站在时代的高度，着力发掘了《演义》的文化内涵。谭洛非分析了《演义》长盛不衰的原因，指出除了故事的生动感人，前人集体创作的良好铺垫，罗贯中的学识阅历和艺术功力等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它适应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清明政治的理想，对英雄人物的渴望，宣泄了爱憎分明的民族感情。而且，在《演义》成书以后，又不断得到民间传说、文人诗歌和戏曲创作的丰富和发展，在人民群众头脑中的印象更加生动而深刻，从而吸引更多的读者。李时人认为，《三国演义》所以能对数百年来民族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是由它的“亚史诗”或“中国式史诗”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三国演义》在成书过程及其题材内容方面，在表现一定时代民族的行为方式和思想精神方面类似史诗，但它并非产生于原始的史诗时代，叙事方式也与“原生史诗”有差别，这一切又与我们民族的文化演进的特殊性有关。因此，《演义》可以称作“亚史诗”或“中国式史诗”。陈辽通过《演义》，对传统文化心理作了广泛的透视，概括了其中肯定智慧、重视谋略、歌颂武勇、鼓励奋进、积极入世、秉公执法、提倡求实、宣扬“满遭损、谦受益”等七个方面的积极成分，认为《演义》肯定这些方面，对于培养和发扬进取、向上的民族精神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他还剖析了《演义》所反映的传统文化心理的消极方面，认为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作者当时认为是正常的、值得肯定的，但在今天却只有消极意义的文化心理，如“忠”、“义”、因果报应等；另一部分是作者当时也认为应该否定，而在今天更应彻底否定的文化心理，如等级观念、嫉妒心理等。刘上生深入探讨了《演义》所反映的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指出《演义》一方面以择主观念为核心，通过描写先秦游士心理的复归，反映了古代知识分子对人格平等和人

身自由的要求；另一方面又以尽忠观念为核心，通过表现两汉以来的儒化影响，展示了古代知识分子人伦追求（或制约）的现实风貌。这两个方面的联系与冲突，构成古代士文化心态的主要内容。罗贯中追求的是政治伦理选择和功利选择的结合，择主而事和为主尽忠的结合。然而，传统伦理文化却注定要吞噬掉古代知识分子的一切个体人格意识的萌芽。梁归智则集中剖析了《演义》再三宣扬的“知遇之感”的文化意蕴，认为它具有使政治人性化 and 理想化的功能，可以促成情志与才智的互动结构，并能造成对人生孤独感、虚无感的理想化解。胡世厚、卫绍生分别考察了《演义》的天命观和妇女观。对于前者，他们认为罗贯中在天命与人事、天意与民意、天理与人欲等问通上，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传统的天人观念和宋代理学的影响，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价值和作用；关于后者，他们认为罗贯中一方面肯定女性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地位，另一方面却常常对女性的情感表现和社会活动持苛刻态度，表现出矛盾的心态。赵庆元研究了《演义》的重学意识，认为它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强调为学要有目的，二是强调为学要有实用性，三是强调为学要德才兼及。熊笃分析了《演义》对封建君臣关系的描写，指出书中虽然赞扬了忠君死节的正统思想，但不应简单地一概否定；同时，书中也表现了一些与正统思想相悖的伦理观念，包括“兄弟而主臣”的理想君臣关系、“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的君道观、“贤臣择主而事”的臣道观，具有一定的进步倾向。在此基础上，单长江、周甲禄从总体上考察了罗贯中本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单长江分析了罗贯中对“一姓单传”的血缘宗法政治与“唯有德者居之”的开明贤德政治选择上的困惑，对“恶劣情欲”的诅咒与正视，对儒家信义的憧憬与迷惘，指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罗贯中处在断层文化的基础上，审视、反思传统文化以后导演的一出威武雄壮的历史英雄悲剧，旨在挽救沦落的末世；然而，

他却只能引导人们回归传统文化。周甲禄认为，在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过程中，《演义》首先代表着新的时代精神，开启了一代反思的历史；然而，这种反思本身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存在很大局限。作者清醒地意识到传统文化的某些不合理，但却不能从根本上彻底否定它。一方面，作者无法彻底割断旧的精神丝缕；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时听到渴望冲破传统束缚的深情呼唤。

同时，不少学者把《演义》视为我们民族古代智慧的结晶，视为人生的启示录；从人才学、领导科学、军事科学等多种角度，探讨了它的文化价值。任昭坤突破了以往有关《演义》的战争描写的研究格局，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三国演义》与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研究课题，认为军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包含军事思想（包括战争观、战争指导原则、建军思想等）、军事学术（包括军事谋略）、军事技术、军事文艺诸方面；而《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形象的军事百科全书，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冯子礼认为《三国演义》是一部决策学，含有丰富的决策思想；书中的决策活动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最高层次的是“英雄型”，其决策水平表现在：敢于因时立志，立非常之志，能够就军国大事作出正确决策，长于举贤任能，能就立嗣传业作出正确决策，能在治国临民方面作出正确决策；其次则为“豪杰型”、“亚豪杰型”。这些论述，每每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二）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成书年代和版本

这虽是老的论题，本届讨论会上却提出了新的资料、新的见解，因而颇为引人注目。周楞伽早在1981年就在《文学遗产》撰文，介绍了《赵宝峰先生集》卷首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认为门人名单中的罗本即《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在提交本届讨论会的《关于罗贯中生平的新史

料》一文中，他又介绍了《宋元学案》卷23《静明宝峰学案》的记载和清人王梓材增补《宋元学案》时在“罗本”条下加的小字按语：“《戴九灵集》‘书画舫宴集诗序’言：沈师程之友罗彦直氏。罗先生拱，字彦威，则彦直盖先生之字也。”从而说明：罗本“字彦直，贯中乃是他作杂剧和小说时所用的别号，等于今人的笔名。他还有一个哥哥拱字彦威，早已拜赵宝峰为师，研究理学。”文章认为，贾仲明《续录鬼簿》中有关罗贯中的记载并不可信，贾不过谬托罗贯中的知己而已。文章还反驳了说罗贯中是南宋人或元代人的观点，认为罗贯中是由元入明的人，“《三国志通俗演义》写于明初，确无可疑。”张志合则认为，从文学史发展的情况看，在元末明初那样的文学氛围中，尚无可能产生出象《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这样大部头的杰作，并根据明代成化年间刊行的说唱词话《花关索传》和明代前期著名剧作家朱有燾的杂剧《义勇辞金》均看不到《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影响这一现象，认为当时《通俗演义》尚未产生，从而重申了张国光1983年提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说。王长友考察了《三国演义》的稀见版本《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指出它是在《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的基础上增、删评语而来，而“李评本”的正文，又是由周日校刊《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而来；通过认真比勘，他认为此本“钟批《三国》”与钟批《水浒传》同为积庆堂原版，后来又经同一家书坊——二四知馆补刻印行；正文第一卷署“景陵钟惺伯敬父批评，长洲陈仁锡明卿父校阅”，大致可信。沈伯俊系统概括了《三国演义》中大量存在的人物、地理、职官、历法、名物等方面的“技术性错误”（指那些并非出自作者有意虚构，并非艺术描写的需要，而纯粹由于作者知识的局限或一时笔误，或由于传抄、刊刻之误而造成的、属于技术范畴的错误），论述了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必要性，认为这是有

功于罗贯中、有益于读者的好事，并提出了校理的原则和方法。

（三）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和审美价值

关于《演义》的创作方法，学术界普遍认为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也有学者认为主要是浪漫主义的。黄钧在《〈三国演义〉和中国的古典主义》一文中却认为：“《三国演义》既不是现实主义的，也不是浪漫主义的。在中国叙事文学中，它应该是一部比较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古典主义作品。”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都是历史性范畴，它们只能诞生于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维护皇权，崇尚理性，追求理想的和谐美，按照理性判断以塑造类型性形象，构成中国古典主义的四大要素。《三国演义》正是如此。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它塑造的人物均属类型性形象，人物自身及性格内部不存在矛盾斗争，促使情节发展的动力只能是性格之间的斗争。部分学者不同意说《演义》人物是“类型性形象”的观点，如俞晓虹即认为《演义》的主要人物形象已经突破了类型化的藩篱，表现出性格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刘上生则认为，《演义》的人物描写艺术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以个别形象进行类型概括，并使这种概括单一化、绝对化，同时又使这些人物仍然保持历史人物应有的特殊性和生动性；二是以形象群体进行类型概括，同时又注意其内部个体差异的描写。因此，《演义》塑造形象的基本方法是：既强调类型概括，又注重个体差异。

关于《演义》的创作思想，王立兴认为：历史演义不同于一般小说创作，它依违于历史与文学之间，有着自己的特殊要求。罗贯中自觉地把握了历史演义的艺术法则，正确地处理了尊重基本史实与驰骋文心的关系，写出了一部艺术化的历史，并使之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英华。

关于《演义》的审美价值，一些学者进行了认真的探讨。赵伯陶的《〈三国演义〉艺术接受三谈》、傅隆基的《〈三国志通

俗演义》的叙事艺术浅探》、潘贤强的《儒释道影响与〈三国演义〉审美规范初探》、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诗词与中国文化》、王泽君的《试论〈三国演义〉诗词等韵文的运用》、顾鸣塘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谣谚成语经纬谈》等，或提出新的论题，或选择新的角度，读来各有新意。

（四）关于《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

近年来，这一方面的研究已有较大进展。本届讨论会上，又有部分学者就此进行了新的探讨。其中，最为人们关注的仍然是《演义》的真正主角诸葛亮。杜景华、王立言、曹学伟、欧阳代发、何志国等人的论文，或追踪诸葛亮的内心世界，或分析儒、道思想对诸葛亮形象的影响，或发掘诸葛亮形象所反映的民族性格，不乏精辟之见。秦彦士寻绎了诸葛亮形象得到全民族认同的文化心理原因：首先，诸葛亮形象反映了传统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的普遍愿望；其次，诸葛亮形象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传统道德的追求；其三，诸葛亮形象寄托了广大人民对美好社会的理想。叶松林对关羽形象进行了文化透视，认为《演义》中的关羽，既是充满忧患意识的义士，又是努力自我实现的圣人，进而成为威力无比的天神；他的全部活动，无不制约和规范于儒家伦理道德。梅铮铮从审美的角度分析了张飞性格，认为其魅力来自几个方面：性格外化与内在的统一，“虚实相半”突出了人物性格，性格和语言的同一性，性格的发展与同一性格的多样表现，壮美性格与读者美感心理相适应。姚品文、张峰分析了《演义》中的赵云形象，认为他是蜀将中唯一的集才、识、德于一身的英雄，是体现罗贯中良将理想的一个典型；蜀汉英雄的命运大多数是悲剧性的，唯独赵云善始善终，但他却因此而缺少悲剧人物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李兆成分析了罗贯中笔下的孟获形象，认为这位南中各族的首领血肉丰满，个性鲜明，具有深刻的内涵，堪称我国

文学史上第一个颇为成功的民族首领形象。

除了对单个人物的研究之外，有的学者还研究了《演义》中的群体形象。如王枝忠、武裕民考察了《演义》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分析了他们在“出世”与“入世”问题上的不同心态和行为，认为《演义》对知识分子的特征和作用的发挥作了规律性的揭示，堪称描写古代知识分子活动的最好的一部教科书。冯全生综合《演义》对群雄之死的描写，探讨了罗贯中笔下人物的一个特定方面。赵义山则研究了《演义》塑造人物的审美特征，把它概括为三点：一是真实之美，即通过多种途径，运用多种艺术手段来写活人物形象，使人如闻如见；二是繁复之美，即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三是凸现之美，即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特别凸现其某一方面，给读者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还有一些论文也值得一读，如宁希元的《〈三国志平话〉成书于金代考》、陈年希的《〈三国志后传〉考论》；宋常立的《〈三国演义〉智谋故事模式及其深层结构》、李汉秋的《借：三国人物的用术规则》、李儒科的《酒与谋略》、胡邦炜的《论历史与历史小说》、齐鲁青的《〈三国演义〉与明清演义小说批评》、吴松泉的《毛泽东与〈三国演义〉》、盛瑞裕的《爱新觉罗氏与〈三国演义〉》等等。

会议期间，代表们参观了绵阳市的主要三国遗迹富乐山（当年刘备、刘璋聚会宴饮处）和西山（蒋琬墓所在地），考察了梓潼七曲山大庙和古蜀道遗迹，对在绵阳兴建“蜀汉旅游城”的有关问题积极发表了意见，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

会议结束前，在充分酝酿和民主协商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了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在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确定了领导成员的分工（学会理事会名单另发）。

综观整个会议，内容充实，讨论热烈，气氛和谐，获得了圆满成功。在《三国演义》研究史上，本届讨论会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历史、道德评价的悖理与 传统文化心理

谭洛非

一般来说，历史的评价与道德的评价应当是统一的。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之一的道德，是社会经济基础即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反映，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标准。但是，道德作为一种观念形态，一经形成以后，又有自身的延续性和继承性，它会逐渐积淀起来，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一种特别重视伦理价值的文化潜意识。这种文化心理与历史的发展，有适应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而在社会变革时期，历史的进步与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也就显得愈加突出。这样，在以往的阶级社会中，一部人类文明史，似乎总是在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二律背反的悲剧中行进着。因而，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后人往往在天平的一端（历史的评价）与天平的另一端（道德的评价）之间来回摆动。甚至走上两个极致，或者只讲道德评价而不要历史评价，或者只讲历史评价而不要道德评价。前者可称为非历史的道德倾向，其结果可能保持传统道德的“完善”，但把那些陈旧的、过时的伦常秩序也原封不动地承袭下来，导致社会的停滞和落后，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这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观点；后者可称为非道

德的历史倾向，其结果虽然客观上暂时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排斥一切道德情操，甚至连维系人类社会生活的一般伦理准则也置之不顾，使恶言恶行恶性膨胀，也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失掉人心、民心，最终阻碍着社会的进步，这也是一种反历史主义观点的表现。形成这两种极端化的关键，是对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缺乏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要么全盘接受，把坏的东西也继承下来，要么一律排斥，把好的东西也同脏水一起泼出去。因此，对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既从历史的角度，又从道德的角度，加以全面的审视，使之得到一个为大多数人接受的公允评价，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这种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悖理，在古典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更为复杂。因为文学作品既然是现实或历史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作家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作家的美学思想，也就是作家对这些人物的褒贬，必然要表现在作品当中；而读者在接受这部作品时，必然还要掺入他自己的审美观点，作出或喜爱或憎恶的选择和判断。在作家和广大读者的双层过滤中，那蕴藏在中国人民心灵深处的传统文化心态——惩恶扬善的伦理观，便经常起到了导向作用和制约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在评价文学人物的历史的、道德的、审美的三个角度中，都离不开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对有的历史人物来说，这三者比较统一，便容易得出为大多数人接受的一致评价；对有的历史人物来说，这三者不能统一，甚至互相矛盾，便会出现众说纷纭的各种不同评价。

一部《三国演义》，创造了这三者或统一或矛盾的一系列代表人物。现在，我们就把曹操和刘备这两个形象，放在历史的、道德的、审美的三棱镜下，作一些对比和分析，探索这些人物的评价与传统文化心理的内在关系，从而得出于我们有益的经验教训。